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70 YEARS
OF EDUCATION
IN THE PRC

共和国教育70年

第二卷

山重水复

1966—1976

杜成宪 | 主编 蒋纯焦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共和国教育70年

第二卷


山重水复

1966—1976

杜成宪 | 主编 蒋纯焦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教育 70 年 / 杜成宪主编; 张礼永等著.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5705-2037-4

I. ①共… II. ①杜… ②张… III. ①教育史—中国
—现代 IV. ①G5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71542 号

共和国教育 70 年 (全四册)

GONGHEGUO JIAOYU 70 NIAN

杜成宪 主编 张礼永 蒋纯焦 张继玺 王明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64.75 印张 字数 1000 千字

2020 年 9 月第 1 版 202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705-2037-4

定价: 198.00 元 (全四册)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20-4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REFACE

“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育不只是教育，而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生产、军事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要梳理和叙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工作，绕不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思想斗争。由于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矛盾对立来看待和管理学校，原有的教育理论、管理体制、课程教学、招生制度等无不受到批判。教育理论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前用17年时间在学习苏联经验基础上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被贴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管理体制方面，教育部和各省市教育局被撤销，代之以国务院下设的科教组、各省革命委员会下设的文教组，学校则由驻校部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行管理。课程教学方面，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著作天天读，“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招生制度方面，废除考试，大学不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代之以推荐工农兵入学。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对教育学中的经典命题提出挑战，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尝试。如：消解教师的主导作用，批判教师中心论，大破师道尊严；批判学生主要以书本知识间接地认识世界，要求学生投身三大革命运动，向广大劳动人民学习，甚至安排大量的时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教学中的基础性、渐进性被批判，缩短

学制、精简课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发布了大量的直接针对教育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社会化、社会教育化，学生要兼学别样，各行各业要办学校，知识青年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谋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缩小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差别。（3）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师生还要走出校门，参加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4）否定教师专业化，让工农兵管理学校，教师队伍则要分期分批接受劳动改造，补充部分工人师傅、贫下中农、革命学生上讲台。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某些指示和设想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中难以行得通，导致“教育革命”不断地走样，离初衷越来越远。

虽然“文化大革命”对农村地区普及教育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下移，但盲目发展，规模大，质量低，结构严重失调，这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基础教育的基本评价。就高等教育而言，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总体上，“文化大革命”对学校教育破坏大于建设，不过倒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教育的核心或基本问题，如教育公平、师生关系、理论与实践、综合与分科、普及与提高、纪律与自由、招生与考试、学校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在教育学上具有普遍性、终极性。今天或以后，我们仍然要不断地面对这些问题，不懈地探索这些问题。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前言 / 1

第一章 停课闹革命 / 1

-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2
- 二、大字报与工作组 / 6
- 三、红卫兵运动 / 10
- 四、“破四旧” / 17
- 五、文斗与武斗 / 25

第二章 复课闹革命 / 31

- 一、成立革命委员会 / 32
- 二、学制要缩短 / 38
- 三、课程要精简 / 42
- 四、教学要改变 / 48
- 五、考试要革命 / 55
- 六、“兼学别样” / 57
- 七、“掺沙子” / 61

第三章 学校如何办 / 65

- 一、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 / 66
- 二、“七二一”工人大学 / 74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学校 / 80
- 四、街道工厂管理市区学校 / 85
- 五、开门办学 / 89

第四章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97

- 一、上山下乡 / 98
- 二、“再教育” / 104
- 三、生命之歌 / 110
- 四、“统筹解决” / 115
- 五、“五七”干校 / 127

第五章 恢复与整顿 / 133

- 一、招收工农兵学员 / 134
- 二、提倡基础理论 / 140
- 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142
- 四、高校招生注重文化考查 / 145
- 五、《园丁之歌》 / 147
- 六、“三项指示为纲” / 150

第六章 两度反复 / 155

- 一、“反潮流” / 156
- 二、朝农经验 / 166
- 三、批孔运动 / 174
-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 181
- 五、“两个凡是” / 184

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66—1976） / 189

主要参考文献 / 206

CHAPTER

01

第一章

停课闹革命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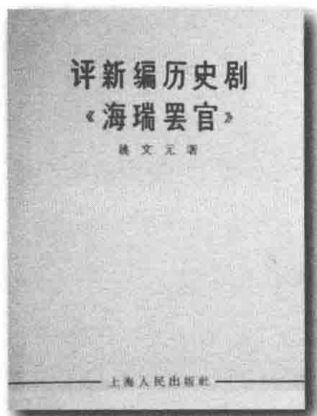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的《五一六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学术界和教育界便成为“文化大革命”最初发动的两个重要领域，随着大字报的出现和红卫兵的兴起，学校纷纷停课闹革命。“革命”师生走出校门，到处串连，“破四旧”，“立四新”，并参加各个领域的批判斗争和夺权运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评明史专家吴晗1961年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剧中的海瑞形象是作者“精心设计过的”，是“一个假海瑞”。文章结论说：“《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文章发表后，从11月12日至26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先后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各大报纸转载时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将姚文元印成单行本发行。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单行本

在此形势下，全国文教界开始激烈讨论《海瑞罢官》，尤以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文科院系居多，许多人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担心。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有人认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有失公平。这样一来，古代史就很难研究了，历史剧更难写了。12月2日，《北京日报》还专门召开文科大学生座谈会，批判和讨论《海瑞罢官》。

链接

历史剧《海瑞罢官》



1979年北京出版社新出版的《海瑞罢官》

1961年，吴晗应北京京剧团之约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

这部戏写的是明朝官员海瑞任应天府巡抚时的事迹，时间在1569年6月到1570年1月。故事情节是：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三子徐璠仗势霸占民田，抢走赵玉山的孙女赵小兰。赵小兰的母亲洪阿兰到华亭县衙告状，县令王明友庇护徐家，以杖杀赵玉山、斥逐洪阿兰结案。海瑞微服察访，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判处徐璠、王明友死罪。徐阶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出强

占民田要退，徐璠犯法要办。徐阶派人上京买通太监、权贵，海瑞遭到弹劾，被罢免。就在新巡抚上任前，海瑞下令处决徐璠和王明友，交出巡抚官印，罢官归田。

从1965年底到1966年初，全国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升温，大量措辞严厉、极左观点的文章见诸报端。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形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递交给中共中央。《二月提纲》

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学术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意在给批判《海瑞罢官》降降温，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通篇言辞斟酌，用意深刻，既力求政治正确，又不失专业水平。

196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中宣部及其他中央机关提出批评，要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4月，《二月提纲》被撤销。4月17日，中共高等教育部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地区14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党委宣传部长和团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和部署批判吴晗及其《海瑞罢官》，认为这次学术批判是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是高等教育高教革命的灵魂，要放手发动师生员工参加战斗。此后，教育界和文化界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批判战斗组，写批判文章，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严厉批判《二月提纲》所犯的错误，认为“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接着，《五一六通知》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稍后，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主要内容有：（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2）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3）“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4）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5）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6）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7）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8）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十六条》对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具体提示：“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这为后来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方案提供了政策依据。

链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节录）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

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二、大字报与工作组

1966年5月25日，《五一六通知》发布九天后，北京大学贴出“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批评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大字报贴出后，北大校方予以反击，校党委组织贴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大字报。

形势很快发生变化，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把所谓资产阶级的‘学者’‘专家’‘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第一张大字报全文，题为《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新市委当日又改组北大党委，撤销陆平和彭珮云的一切职务。

6月初，各地报纸大量刊发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北大大字报的文章。北大一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师生基本停课，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首都高校、机关、厂矿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北大。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形容北京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学贴出“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

学简直是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

在北京大学的示范下，全国各地革命师生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纷纷“拿起笔，做刀枪”。大字报很快充斥了大中专院校、普通中学和教育行政机关，成为一种致命性的政治武器，要打倒谁，就先贴谁的大字报。一些学校专门在校园内搭建一批席棚，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篇幅长短不一，有的只有一两张，有的则长达数十张。

1966年6月2日，清华大学贴出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北京师范大



“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北大参观大字报的人流

学贴出炮轰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师大是“三家村”的分店》。6月3日，复旦大学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组织游行，宣布“停课闹革命”。华东师范大学6月初至7月初共贴出大字报一万八千多份，且学校在6月中旬就通知停止授课，暂停学期考试。

由大字报煽动起来的造反风潮，严重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许多学校（尤其是大学和中学）党委一二把手被批斗，校长被打倒，学校党组



爬上梯子贴大字报



青年学生集会支持北大“革命派”

织和行政机关无法正常工作。6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向各大学、中学派驻工作组，以加强党的领导，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同日，第一支工作组由张承先带队，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稍后又陆续向在京高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如孙友渔工作组进驻北京师范大学，赵如璋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叶林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邹家尤工作组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各省市也相继向部分高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制止混乱局面，如上海市6月10日派出以陈琳瑚为首的五人工作组进驻同济大学。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采取两种手段：一方面接管学校，领导师生贴大字报，继续揭发、批斗部分干部和教师。如清华大学工作组进校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将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归为牛鬼蛇神。6月12日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北京大学则继续批斗陆平，“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声讨其“罪行”，并宣布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另一方面，为稳定局势，控制群众运动，工作组又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有不成文的“八条



南京大学的大字报

规定”，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北大工作组甚至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校门。

三、红卫兵运动

《五一六通知》在对政治形势较为敏感的青年学生中激起了风浪。清华大学附中几位政治热情高涨的学生，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校内校外形势。他们深信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面临着党要变修、国要变色的危险，决心投入到保卫毛主席、捍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去。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废墟上悄然集会，决定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战斗小组，取名“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他们一起宣读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一张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署名“红卫兵”。这一署名引起了围观者的好奇心，许多人便在“红卫兵”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不到一上午，签名者就达百人之多。消息传开，北京不少大中学生跑到清华附中来参观这张大字报，回去后纷纷贴出以“某校红卫兵”署名的的大字报，以示声援和支持。6月初，北京一些高校附中（如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相继成立了“红卫兵”或与之类似的群众组织（如“红旗”“东风”等）。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一些“红卫兵”组织和成员遭到管教，限制活动。

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美国副总统的文章《汉弗莱的哀叹》，首次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讲过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文中还说：“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